

刘达科 著

解续河汾诸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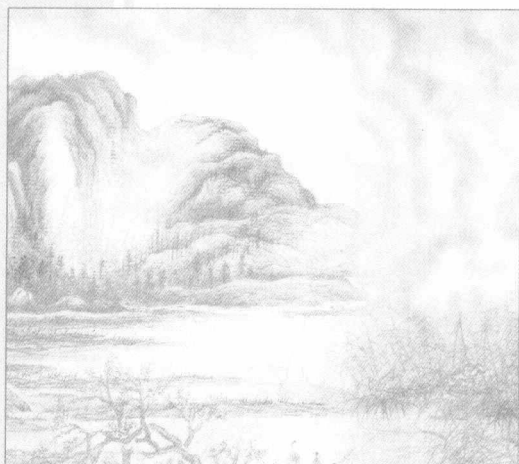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解读河汾诸老

J I E D U H E F E N Z H U L A O

刘达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河汾诸老 / 刘达科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6

ISBN7-5063-1628-5

I. 解… II. 刘… III. ①河汾诸老—文学研究—中国—金代 ②河汾诸老—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121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960 号

解读河汾诸老

著者: 刘达科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钟伟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 bat. net. 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 / 32

字数: 226 千

印张: 9 插页: 2

印数: 1—1000

版次: 2005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5063-1628-5 / 1.2339

定价: 20.8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周惠泉

江苏大学刘达科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辽金元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重要学者，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下百万字的研究成果，令人感佩。而他对于金末元初“河汾诸老”的研究，则处于学术界的领先地位。他在 1991 年发表《河汾诸老诗歌初探》一文，这是 20 世纪初以来有关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专论，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文章发表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即全文转载。从那时起，他一直在辽金元文学、特别是河汾诸老诗人群体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达科先生又完成了系统全面研究这一作家群的重要著作《解读河汾诸老》，把这一作家群的研究推进到更高的学术层次和理论水平，实在可喜可贺。

“河汾诸老”是金、元之交活跃在黄河、汾水流域的重要诗人群体，他们同集金代文学大成的杰出诗人元好问一起，为金代文学的发展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由于元好问在金末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不收当时在

世之人的作品，因而金、元之交的诗人、诗作多有遗漏；正因为如此，元初的房祺于“大德辛丑岁”即大德五年（1301年）纂辑成书的《河汾诸老诗集》可以视为《中州集》的续编，是金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但是前人对于这一重要作家群很少加以研究，令人不能不深感遗憾。达科先生则筚路蓝缕，勇于开拓，在从事辽金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河汾诸老”用力最勤，因而成就最著。他采取从中观入手、从微观用力的方法，撷取一个与金、元文学有着广泛联系的作家群作为横切面进行研究，理清本时期文学的源流走向，以期从宏观角度审视本时期文学的发展演进，抽绎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是他新近完成的《解读河汾诸老》一书，堪称代表该领域前沿水平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既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对河汾诸老作了整体性考察，也逐一分析论述了该作家群中每一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历史地位以及生平思想、家世交游等全方位的内容，且新见迭出。在辨析“河汾诸老”称谓的内涵和性质时，提出了文学流派、文学集团和文学群体三个范畴是在内涵上逐次宽泛的概念这一观点，认为河汾诸老应被视为文学群体。考察河汾诸老创作情况时，紧密联系其生存、生活状态，并以金室南渡和蒙古灭金为断，将诸老的活动分为前、中、后三期。探讨河汾诸老的诗学思想和宗尚时，提出这一诗人群体师从元好问宗唐变宋的诗学取向。评价河汾诸老的历史地位时，借鉴了西方“读者反映批评”的理论和尧斯的接受美学的观点。人们历来都把河汾诸老的创作视为遗民文学、隐士文学，但诸老中不少人曾出仕新朝。解释这种现象时，作者提出金、元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河汾诸老

在前朝大都为平民，因此并不以“食周粟”为耻，自然更不妨为学官而“隐于学”。谈到河汾诸老的道统观时，作者认为他们在金、元易代之际抛弃了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意识，以是否“能行中国之道”作为判断是否为道统继承者的标准，并以之作为其立身出处之依据，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这批汉族儒士身处政权更替和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的心灵轨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观点都是前人很少论及的，而且较为精当、科学而有说服力。在每一具体问题的阐述上，都显出追求真实、讲究实际、不务虚谈的学风。该书在史料钩沉、史实考订上也颇见功力，书中披露了很多前贤时彦未曾发见的史料，例如从《永乐大典》中发现房皞佚诗《别西湖》组诗的第二、三首，段成己佚文《梓人遗制序》等；史实的考证方面也有不少突破性进展，例如麻革生卒年、曹之谦生卒年的推考，均为首次面世的成果，过去从未有人涉及。对于河汾诸老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其他学者虽然零星发表过少数论文，但是只有达科先生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将自己的成果公布于世。而且无论就本课题研究的涵盖面还是就探讨问题所达到的深度而言，本书均将该领域研究推进到新的学术水平。总之，达科先生十馀年来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迢迢断续、进取求索，以达精益求精、实至功成之效，终于使该领域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得以面世。此外还应指出，本书对于“河汾诸老”现存的主要作品——《河汾诸老诗集》经过认真点校、扼要注释而附于理论阐述之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它把自己的研究与河汾诸老的原作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以便读者观赏比较、进行独立思考，这在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中是不

多见的，充分体现了达科先生不满足于因循惯例的创新精神。

达科先生对于辽金元文学研究的创新突破，除了河汾诸老研究以外，我个人认为主要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非常关心辽金元文学学术历史脉络和当代学术前沿热点问题的研究，这很有利于他较准确地把握本学科的学术进展方向，与时俱进地更新学术观念，对所探讨的问题作出整体性的、高屋建瓴式的论断；第二，他十分重视辽金元文学、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参与主持了《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大型文献的编纂，撰写了《辽代文学史料整理的回顾与思考》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目前还正在承担傅璇琮先生组约的《辽金元诗文史科学》一书的撰写任务。这使他的辽金元文学研究具有坚实而可靠的文献学基础；第三，他对于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钻研，从而为科学、全面地认识多民族、多区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而回顾多年以来达科先生的辽金元文学研究，其最突出的特点，乃在将多民族、多区域的中国文学观运用于辽金元文学的研究实践。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辽、金、元三朝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又都崛起于长城以北的草原山林地区，相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粗犷剽悍、磊落豪爽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学艺术带来了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格调和风貌。农耕民族的生活节奏相对而言比较舒缓，农业生产自然也有一个不违农时的问题，但拖延一点时间

一般不至于引起过分严重的后果；而游猎民族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狩猎的对象往往是凶猛的野兽，如果猎手的动作哪怕稍微迟缓一点，转眼之间很可能就会变成猛兽的口中之物。可见北方民族所以具有耿介直爽、诚信无欺的品格，同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允许留下更多转弯抹角的时间密切相关。其思维惯性沉淀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当中，成为北方民族思维方式世代传承的重要特点。与之相应的，这也就是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乃至文学观念产生的民族心理根源。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多民族、多区域的复合文明体系，正如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一样，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也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不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给予层次较高一方不可忽视的冲击影响。在本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曾经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吕微《“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当中原的正统文化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地区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与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演进、整合与创造，从而确保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仍然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更新、永不停顿与衰败的动力学原理。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草原游牧文化圈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

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国与大一统的版图之内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850年，远远超过这段历史进程的二分之一，为其他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那么，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与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这是一个足以令人深长思之的、说不尽的话题。从文学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将会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华多民族文学无比丰富的深刻内涵与相激相融的客观规律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辽金元文学既然植根和成长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上，因而实际上乃是一种同中原固有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蕴含某些新质的文化。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崛起，体现了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融合互补的历史趋势，为多元一体、有容乃大和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亟待认真加以解决。而辽金元三朝是民族碰撞、民族交往十分活跃的时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标本与模型。正是从辽、金、元时期开始，伴随着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逐渐改变，戏曲、小说等新兴文体一步步登上文坛的中心，通俗化、大众化成为文学

发展的重要流向。在中国文学这一历史性的蜕变当中，辽金元文学乃是不可或缺的活跃因素，对于中国文学的转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达科先生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按照一定规律在信息、能量和物质诸方面进行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换和互动的大系统。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熵增加的过程。古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耗散的过程。每当它的平衡运动被干扰出现无序状态时，北方民族总能提供新的素质和机能使其恢复平衡态和生命力。北方民族文学清雄遒健、质实贞刚、粗犷豪越的风格对汉文学的影响是人所共睹的。北方民族文学还为古代中华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词语、修辞技巧和表达手段，促使某些新型文体的产生，推动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文人队伍的生成。北方民族特有的浓厚的原始遗风和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之间的冲撞、磨合和交融使主体文学不断强化娱乐功能和审美特性，终于在宋、元时完成了内部体式结构的转换，并在明、清出现了俗文学全面高涨的局面。”（《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3期）以这样的认识和观念研究辽金元文学，自然容易抓住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由于正统思想与民族偏见根深柢固的影响，能够有幸保存下来而反映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激相融关系的文献资源十分有限，并且高度分散。于是今天想要恢复辽金元文学的原生态，实在勉为其难。相关的研究哪怕取得些微的进展，都要比常规的研究付出更为艰辛的代价，这也正是该领域研究应该着力突破的难点所在。达科先生以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致力于此，

用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对于辽金元文学进行了锲而不舍的追寻与探索，并且取得了来之不易的业绩，实属难能可贵。

达科先生嘱我为其大著作序，以本人区区素养学力，实不敢当。不过有幸最先拜读达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深感快慰。于是不揣浅陋，欣然命笔，聊陈浅见于上，如果达科以为尚有一二可取之处，即请忝列大著之前，是为序。其中倘有不妥，还请达科先生和读者同好指谬赐教。达科年富力强，思想活跃，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必将先我着鞭，取得更大的成就；本人虽然年届六旬而不知老之已至，自我感觉身体和精神状态尚好，在未来的学术追求中愿与达科先生这样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友人共勉！

2004年6月于长春

附记：本序文章成后，曾以《金元诗人群体研究的重大进展——〈河汾诸老诗人群体研究〉序言》为题发表于《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因本书出版时改作现名，又就相关文字略作更改。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补述于此。周惠泉

目 录

内 篇

诗才鸣河汾，文脉系金元

——河汾诸老的总体观照……………（3）

海内名士 文章钜公

——麻革及其创作……………（27）

布衣终生 诗情迸溢

——张宇及其创作……………（45）

振铎河、洛 建功两朝

——陈赓、陈庾及其创作……………（50）

宗唐得古 融通陶、白

——房皞及其创作……………（64）

达不掩忧 交织成文

——段克己、段成己及其创作……………（78）

遗山挚友 平阳名儒

——曹之谦及其创作……………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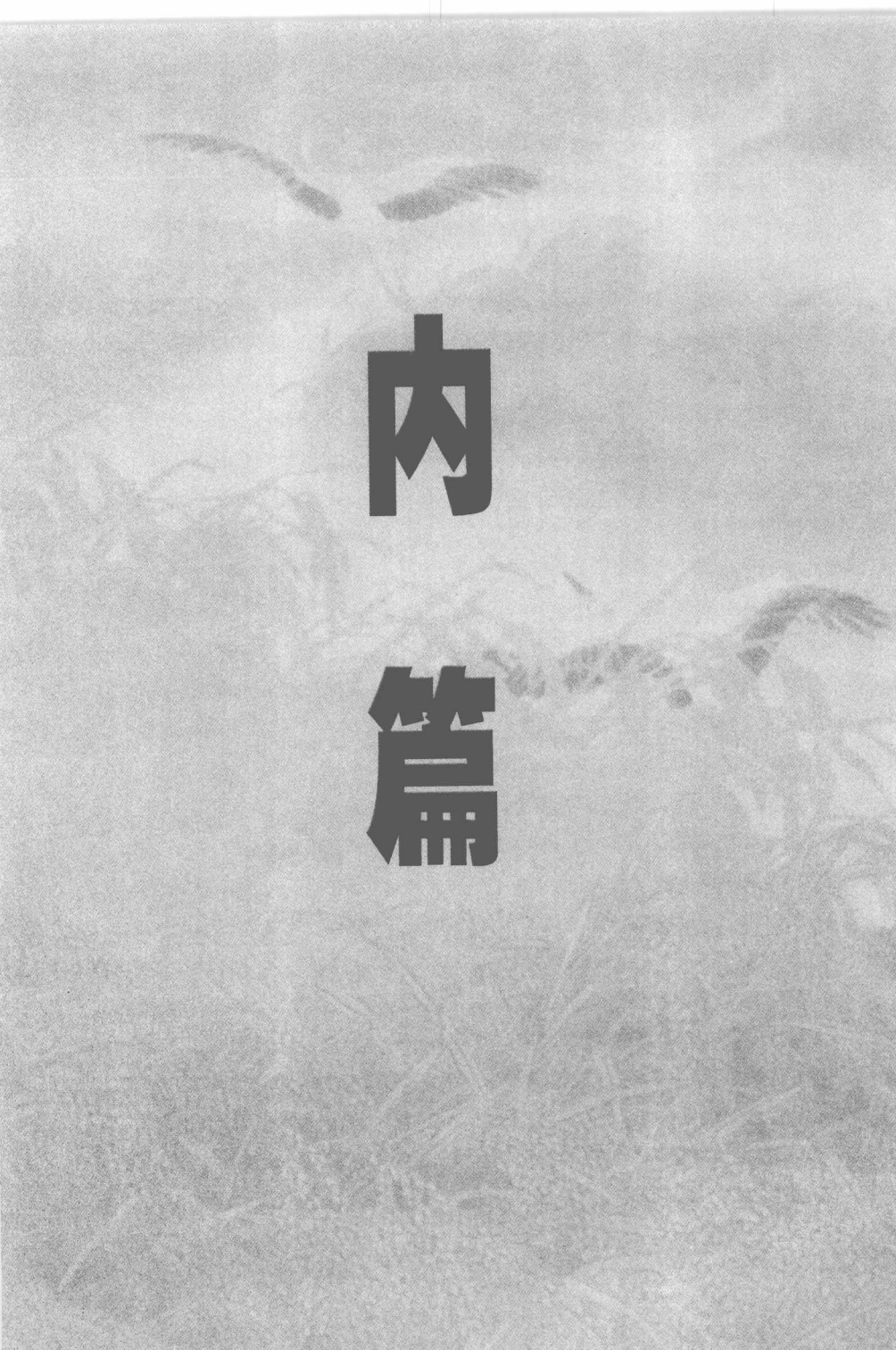
外 篇

河汾诸老年谱要编…………… (129)

河汾诸老交游考述…………… (145)

河汾诸老诗作笺校…………… (210)

参考文献要目…………… (273)



内

篇

诗才鸣河汾，文脉系金元

——河汾诸老的总体观照

金末元初，一批出生或落籍于黄河、汾河流域的平阳、河中两府和绛、解两州的文人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创作群体，包括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 8 位作家。他们都是由金入元的遗民，故后人称之为“河汾诸老”。河汾诸老以元好问为宗，在诗学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上坚持“以唐人为指归”（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是金元之际诗坛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对繁荣当时中国北方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历史贡献。

称谓申说

河汾诸老之称谓始于元大德年间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有关房祺的史料不多。根据其《河汾诸老诗集后序》，可知他自号横汾隐者。成化《山西通志·人物》和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载，房祺，临汾（今属山西）人，曾官河中、大同两府教授，以潞州判官致仕，著有《横汾集》，子希文，泰定甲子（1324）乡试第一，著有《渊云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河汾诸老诗集》的出版说明认为房祺

“大概为房俾的后裔”。《河汾诸老诗集》成书于大德五年（1301）。从房祺于后序自署横汾隐者推断，此书当为晚年所编成。由此可进一步推测出，房祺约生于金亡之际或金亡后不久。

《河汾诸老诗集》辑录八位河汾诗人的诗作共 201 首，卷以人分，共有 8 卷。从此，“河汾诸老”就成了这 8 位作家的专称，流行于文坛、史乘。

河汾诸老又有河汾诗派、河汾诸人、河汾诗人和河汾诗人群体等称谓。

房祺在自序中有“吾乡学者如林，有能慕河汾之派，观是集者，知所兴起云”之语，即揭示其编纂宗旨，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河汾诸老”内涵的认识。

当代学界有不少人就此生发，提出“河汾诗派”这一范畴。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蔡美彪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辽宋西夏金史》分册写的《金朝》条目释文：“河东诗人以元好问为宗，形成河汾诗派。”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第五章《元杂剧的盛衰与科举、理学》称金亡后在平阳讲学的麻革、曹之谦等人“与居住在太原附近的元好问互通声气，形成了有名的河汾诗派。”

李旦初《论河汾诗派的形成及其文化背景》一文也使用了“河汾诗派”这一概念，但他主张扩大“河汾诗派”的涵括范围，认为该名称并不仅指《河汾诸老诗集》所收 8 位作家，“河汾诗派是指金末元初以山西一批诗人为主，集结在元好问周围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并进一步说明：“房祺对于河汾诗派的界定，完全是从乡土观念出发的。亦即他以诗人的籍贯作为归派标准，把这个流派的范围限制在以平阳为中心的地带。这样的地域界定，显然过于狭窄。且不说根据现代关于文艺流派构成的原理，即使按照房祺所说的‘河山胜概’、‘地土所宜’、‘习俗所